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88期（民國104年6月），231-237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新村容子，《アヘン戦争の起源——黄爵滋と彼のネットワーク》

東京：汲古書院，2014。408頁。

唐屹軒*

受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影響之故，鴉片戰爭成爲最初探索中國近代史的切入點。不少研究者均以鴉片戰爭爲主軸，論析中國近代的起源，迅速掌握時代轉變的特點，如張馨保（Chang Hsin-pao）《林欽差與鴉片戰爭》（*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和德里普·巴蘇（Dilip K. Basu）的“The Opium War and the World Trade System”等。[1]然針對此一研究取徑，已有若干省思，[2]且研究熱度亦略有降溫趨勢。日本學界則對鴉片戰爭研究始終保有關注，除著重探討中英商貿、外交互動，間或擴及至東亞區域的整體影響，對重新深入理解清中葉以降的歷史脈動與近代東亞諸國發展甚有助益。新村容子長期浸淫於鴉片戰爭相關研究，2000 年刊行專著《アヘン貿易論争：イギリスと中国》，該書有兩大主軸：其一，圍繞於 1870 至 1880 年代，英國國內針對鴉片貿易問題的論爭；其二，針對十九世紀中國鴉片生產等議題，進行析論。[3]2014 年出版新作《アヘン戦争の起源——黄爵滋と彼のネットワーク》，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1 Chang Hsin-pao,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Dilip K. Basu, “The Opium War and the World Trade System,” *Ch’ing-shih wen-t’i*, Vol. 3, Supplement 1 (Dec. 1977), pp. 47-62.

2 有關費正清研究脈絡的省思，可參閱：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3 新村容子，《アヘン貿易論争：イギリスと中国》（東京：汲古書院，2000）。

有別於過去以鴉片貿易爲核心的研究主題，新書聚焦於士人網絡的連繫與活動，藉以探求鴉片戰爭的起源，爲研究鴉片戰爭開啓另一扇大門。

作者在〈序章〉中直言，由於我們對鴉片的狹隘認識，以及視林則徐（1785-1850）爲抗英民族英雄，遂多以林則徐爲鴉片戰爭相關研究的主要線索。但若以林則徐爲鴉片戰爭核心，將無法解釋爲何林則徐在到任廣東一年前，對鴉片走私與涉外關係漠不關心，卻驟然被派往廣東查禁鴉片。是故，本書之作係爲挑戰張馨保《林欽差與鴉片戰爭》一書的論點，並反駁長久以來將林則徐視爲鴉片戰爭核心的研究取徑。同時，因受到鮑拉切克（James M. Polachek）研究啓發，作者嘗試以黃爵滋（1793-1853）爲主軸，探討鴉片戰爭的起源與士人互動如何影響中央決策。

本書分爲三大部份：第一、「從『黃爵滋網絡』到『清流黨』」；第二、「鴉片戰爭與『黃爵滋網絡』」；第三、「幕末日本人與鴉片戰爭」。作者在第一部份，首先檢討過去「宣南詩社」的研究成果，進而指出：不論「宣南詩社」或鮑拉切克提出的「春禊圈子」（Spring Purification Circle），均應以黃爵滋爲核心，方可予以適切評價；並能合理解釋後續歷史發展的因果關係。因此，作者先鎖定自 1826 年（道光六年）黃爵滋入京任翰林院編修伊始至 1834 年（道光十四年）上奏〈綜覈名實疏〉爲止，由其主辦的大小集會。透過分析歷次與會人員的身分背景與相互關係，作者指出黃爵滋最遲在 1829 年（道光九年）已利用座主潘世恩（1769-1854）的影響力，成功建構「黃爵滋網絡」。同時也逐步收編漢學與桐城古文派士人如端木國瑚（1773-1837）、林滋秀（1778-1833）、苗夔（1783-1857）和梅曾亮（1786-1856）等人，聲勢日漸浩大。1830 年（道光十年）因蔣攸銛（1766-1830）失勢，黃爵滋運用士人網絡的影響力，爲潘世恩爭取各方支持，包括曹振鏞（1755-1835）、盧蔭溥（1760-1839）、湯金釗（1772-1856）等，潘世恩遂得以於 1833 年（道光十三年）晉升爲大學士，1834 年就任軍機大臣，進入權力核心。1830 年代起，各地水災頻傳，黃爵滋與網絡裡的士人們紛紛賦詩記錄地方災情，甚至屢屢上

疏直言地方官吏腐敗情事。黃爵滋更因次第擢升，大幅增加對各項事務的發言權，尤以 1834 年的〈綜覈名實疏〉爲重大標誌。黃爵滋認爲當前諸多弊病，皆肇因於任用非人與官員名實不符，遂上疏嚴詞批評，內容論及治水與賑災事業、防止地方叛亂、禁止鴉片走私貿易與白銀外流以及人材選拔等多項議題。多位士人獲悉後，無不大聲頌揚，深表贊同。作者視之爲「黃爵滋網絡」凝聚成「清流黨」的先聲，並試圖藉此掌握政治和輿論的主導權。

第二部份作者嘗試梳理「黃爵滋網絡」與鴉片戰爭的關係，以 1835 年（道光十五年）黃爵滋上奏〈敬陳六事疏〉與〈片奏〉爲重要契機，說明黃爵滋開始積極關注中英鴉片貿易的相關議題，並提出相應之道。奏疏中，黃爵滋直指廣東官員涉及鴉片走私貿易，並要求對走私相關人員處以極刑。其後，網絡內好友皆附議聲援，如郭儀霄（1775-？）的〈擬陳時務疏〉同樣呼籲嚴懲不法分子，但反對者隨即予以抨擊。作者大膽推論：許乃濟（1777-1839）於 1836 年（道光十六年）上疏奏請弛禁鴉片的主張，便是爲了反對黃爵滋的〈敬陳六事疏〉和〈片奏〉；且事係阮元（1764-1849）在背後操控。由於阮元曾長期擔任兩廣總督，深知地方商貿生態，故無法認同黃爵滋「嚴法厲禁」之手段；認爲應「暫時羈縻，徐圖禁絕」方爲上策。阮元因此參酌 1832 年（道光十二年）年吳蘭修（1789-1839）的文稿，略事修改，藉許乃濟之名上呈。作者視之爲以黃爵滋爲首的過激派和以阮元爲首的現實派，在政治上的激烈對立。爲回應阮元的挑戰與質疑，黃爵滋先後在 1836 年召開多次集會，目的是爲了拉攏各方勢力並匯集意見。此外，黃爵滋更仿效阮元，假借許球之手奏請採取強硬手段，處理鴉片議題。作者追索許球、潘世恩與黃爵滋三人的連繫，說明許球的奏疏確有可能是在黃爵滋授意下寫成。作者也推論：1841 年（道光二十一年），僅具有舉人身分的朱鳳鳴（1790-1857）竟上書宣宗（1782-1850）嚴詞抨擊時政，要求開復林則徐以對抗英夷；其背後必然有黃爵滋與潘世恩的指點和支持。

爲求達成目的，黃爵滋改變策略，從之前嚴厲要求處死鴉片貿易商的訴求，轉變爲嚴懲吸食鴉片者，成功打動宣宗，遂有派遣林則徐前往廣東查禁鴉片之舉。在梳理黃爵滋等人意見後，作者總結中、英雙方衝突的導火線在於針對鴉片貿易商求處死刑一環，而非過去研究者所認爲是英國爲了打破「廣東貿易體制」，擴大雙方商貿交流，不惜向清朝發動戰事。黃爵滋、林則徐等人強調「刑亂國用重典」，以展現天朝威嚴，嚇阻英夷；英國官員則以維護國家名譽和英人生命安全爲由，採取強硬態度，進而派兵來華。是故，中、英衝突愈漸白熱化，最終導致戰爭爆發。

第三部份爲「幕末日本人與鴉片戰爭」，作者認爲日本沒有民族情感的包袱，較能理性評斷戰爭雙方的成敗得失。本書以塩谷宕陰（1809-1867）纂輯的《阿芙蓉彙聞》和佐久間象山（1811-1864）的隨筆《省諐錄》爲例，論析幕末日本人對鴉片戰爭的觀察與相關認識。《阿芙蓉彙聞》成書於 1847 年（道光二十七年）左右，係塩谷宕陰匯集鴉片戰爭史料與相關情報，以供幕府參酌。作者詳細介紹《阿芙蓉彙聞》各卷內容及其出處，收錄內容從戰爭爆發的遠因、導火線開始談起，其後包括雙方交戰過程、清朝士人對戰爭的檢討評述、善後措施等無不涉筆。文中亦簡述收錄文章的重要性與塩谷宕陰之評論。最後，作者以佐久間象山將魏源（1794-1856）視爲海外同志爲楔子，審閱兩人的對英戰略。作者認爲魏源強調陸地決戰與佐久間象山正視日本缺乏海軍的態度迥然不同，僅在引入西洋軍備與翻譯西書略有共性。而在鼓勵學習西洋新知的對象上，兩人主張亦有歧異，魏源將庶人排除在外，佐久間象山則以全體國民爲目標。涉及華夷思想之處，更有顯著差別。然佐久間象山未能獲得同儕與上司肯定，略有先覺者之孤獨感，遂將相同境遇的魏源引爲海外同志。

綜觀本書，作者細心爬梳士人詩文集，勾勒出以黃爵滋爲首的士人網絡，論析鴉片戰爭的起源，提供吾人重新認識鴉片戰爭與理解清代士人互動的切入點，對清中葉政治史研究有重大意涵。作者試圖扭轉過去以林則徐爲主軸的鴉片戰爭論述，轉而以黃爵滋爲核心，論析黃爵滋及其建構之士人網絡在面臨社

會諸多弊病時，透過書生議政與網絡連繫，形成輿論風潮，不僅能吸納不同立場和派系的士人，更可左右皇帝與朝臣之決策。因此當吸食鴉片者日漸增多且白銀外流日益嚴重下，士人亟思解決之道。傳統思想資源中，「刑亂國用重典」成爲黃爵滋等人採行的嚇阻之法，但因牽涉洋人身分，中、英雙方對於死刑執行問題相持不下，致使最終兵戎相見。

本書另一個重點，在於作者詳盡解析士人網絡的連繫。過去有關清中葉士人雅集的討論研究泰半流於概括式的形容，未能像作者以如此細緻的方式，一一解析歷次雅集成員背景，爬梳士人的互動與訊息交流；並企圖釐清每次集會的目的，進而連接到實質的政治運作。如作者以許球和朱鳳鳴爲例，暗示黃爵滋在背後的運作，透過網絡內多位士人接連上奏，壯大聲勢。反對者阮元亦同樣藉由許乃濟之手，相繼上奏批評黃爵滋之議，眞實展現出雙方你來我往、針鋒相對的態勢。

在作者描繪的黃爵滋網絡中，更引人注目的是揭示潘世恩在網絡中扮演的角色。儘管潘世恩在嘉慶年間即歷任中央要職，道光以降更晉升爲大學士，入值軍機，被視爲鴉片戰爭前夕最有權力的京官，其影響力自不待言，然過去對潘世恩的相關研究卻近乎闕如。作者在書中指出潘世恩乃黃爵滋網絡的幕後支持者，由於潘世恩係黃爵滋的座主，1826 年黃爵滋入京後，首度發起的雅集便邀請潘世恩參與，開始編織士人網絡。其後，黃爵滋爲協助潘世恩競逐大學士、入值軍機，多次發起集會，拉攏各方勢力支持。此外，作者亦提及潘世恩與黃爵滋指使舉人朱鳳鳴上書抨擊時政，並要求開復林則徐，採取強硬對外態度。凡此種種，均讓潘世恩的角色漸次浮出檯面。

儘管本書有上述創獲，但仍有四點值得商榷，在此提供個人淺見與讀者一同討論。首先，探討士人網絡誠非易事，如何確認是否屬於該網絡的一員即煞費周章，然僅因出席聚會能否引爲同道？作者述及 1832 年，因多位漢學士人參與該回江亭雅集，代表黃爵滋網絡已有拓展至漢學考證圈的傾向。但據作者所述，漢學代表人物端木國瑚出席二次，林滋秀與苗夔皆僅參與一次，其後亦

鮮少有所接觸，能否視爲網絡成員，容或有待商榷。1836 年，黃爵滋網絡舉辦多達 48 人的「江亭展禊」大型雅集，其中亦有多位漢學者參加，作者認爲此乃漢學者逐漸認同黃爵滋網絡士人對當前社會腐敗現狀的批評。然 1830 年代正值災害頻仍，加以考證學風潮退燒已久，多數士人已對社會憂心忡忡。現身黃爵滋網絡的雅集，或許只是對特定議題的贊同。反觀姚瑩（1785-1853）因任官之故，未曾參加過黃爵滋召開的集會，雙方卻始終保持書信往來，交流頻繁，作者視姚瑩爲網絡的核心人物。因此，單純依據參與集會與否，認定是否屬於網絡成員或界定網絡之範圍，似乎未臻完善，或可更加深入分析討論。

其二，作者嘗提及黃爵滋以紀念歐陽修（1007-1072）、蘇軾（1037-1101）和黃庭堅（1045-1105）等人誕辰爲由，召集同道聚會雅集，然書中對此未有深入論析，殊爲可惜。翁方綱（1733-1818）因偶得蘇軾手跡與宋版《施顧注蘇詩》殘本，遂發起「爲東坡壽」活動，延續近半世紀之久。加以翁方綱歷掌文衡，包括江西、廣東與山東學政，門生眾多，形塑出獨特學風，其勢力不容小覷。[4]其中，曹振鏞即翁方綱弟子，黃爵滋曾拉攏曹振鏞以支持潘世恩爭取大學士。雙方互動頗值玩味，作者或許能對此多加說明。此外，道光年間尚有一股「顧祠祭」的風潮。顧名思義，「顧祠祭」即是崇祀顧炎武（1613-1682）的聚會活動。「顧祠祭」的源起係因阮元標舉顧炎武的地位，引發何紹基（1799-1873）等人關注，遂於 1843 年（道光二十三年），爲顧炎武建祠崇祀。[5]誠如書中所述，阮元與黃爵滋代表著兩股不同勢力。而參與顧祠祭者，是否代表著另一個士人網絡？若能進一步分析祭祀顧炎武的士人群體及其相關活動，或許能捕捉士人的合縱連橫，亦有助於解析阮元與黃爵滋兩派勢力的競爭過程。

4 有關翁方綱「爲東坡壽」的討論研究，可參閱：魏泉，《士林交游與風氣變遷：19 世紀宣南的文人群體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 34-70。

5 有關顧祠祭與顧炎武在此時復活的相關研究討論，可參閱：James M. Polachek, *The Inner Opium War*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pp. 205-235；魏泉，《士林交游與風氣變遷：19 世紀宣南的文人群體研究》，頁 148-176；王汎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國史儒林傳》與道光年間顧祠祭的成立〉，收入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頁 565-602。

其三，誠如作者所論，鴉片戰爭肇因於黃爵滋等人建議採行嚴刑峻法，制止漸趨惡化的鴉片問題。戰爭爆發前，以黃爵滋與阮元爲首的兩種立場針鋒相對，儘管阮元大聲抨擊黃爵滋的政策，但最後仍由黃爵滋勝出，獲得皇帝青睞。可惜書中對於戰爭結束後，雙方勢力消長未有著墨。若能擇要簡單說明戰後雙方態度有無轉變或更加堅定，士人輿論與中央決策的關係有無生變等，或許能對士人涉外事務的立場以及書生議政的相關問題有更深刻認識。

其四，作者大膽推論潘世恩係黃爵滋網絡的幕後藏鏡人，正因爲有潘世恩的支持，黃爵滋和網絡裡的士人方能大聲諫言，形成裡應外合之勢，進而主導鴉片戰爭前的輿論。雖然作者嘗試呈顯潘世恩的角色，但書中的論述仍稍嫌不足。究竟潘世恩與黃爵滋之間的連繫有多密切？一切作爲是否均爲潘世恩授意？凡此種種，尚有待進一步釐清。唯有清楚梳理兩人的關連，方能準確掌握黃爵滋網絡的運作，以及清中葉以降士人論政的風潮。

士人網絡一直是近年來研究者關注的焦點，本書作者已做了最佳示範，提供後人研究士人網絡的一種取徑。作者在書中述及黃爵滋網絡有若干「清流黨」的意味，與中法戰爭期間李鴻藻（1820-1897）、張之洞（1837-1909）等人的「清流黨」相似。但在文字獄與禁絕朋黨的壓力下，清中葉士人在國事如麻之際，如何發展網絡連繫、議論時政，進而演變至晚清的士人派系、黨爭？凡此種種，皆有待深入探求並一一爬梳，方能釐清清中葉以降政治、社會與學術文化之間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